

中华文化及经典如何实现“双创” “儒学与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专题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刘晓立）3月27日，“儒学与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专题研讨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化及经典的当代阐释”主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研讨。

此次研讨会分设两场主旨报告和三场主题分论坛。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主编王学典，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分别作了题为“继承费孝通梁漱溟学术遗产，加快推进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国文化现代阐释的若干思考”的主旨报

告。随后，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化当代阐释的特质”“传统与现代”“中华文化及经典的解读与传播创新”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讨论，碰撞思想火花，凝聚学术共识。

会议期间，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总经理李岩代表国际儒学联合会，向杭州晓风书屋湘湖店授牌国际儒联首个“儒学书房”。他表示，国际儒联组织专家学者围绕文化传承创新展开研讨，对于展示和弘扬灿烂中华历史文化，推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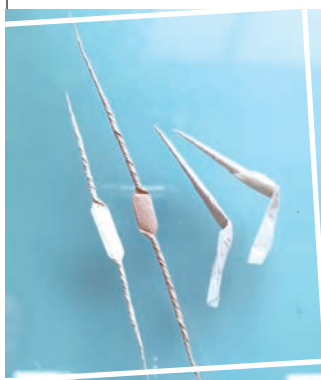
此次“儒学与中华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专题研讨会，是在汇集各家智慧、关注前沿研究的基础上，策划阐释中华文化经典的通识读本，探讨中华文化及经典的当代阐释和国际表达，为推动“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与互学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据悉，此次研讨会是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立项项目，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传世活字（北京）文化有限公司承办，杭州市萧山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杭州晓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等单位协办。



古籍修复是一项传统技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以师带徒的形式手口相传，修复师曾经被称为糨糊工，其对文化传承的作用和价值被低估。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古籍修复不仅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采用“三位一体”的模式进行传承，从业者从不足百人到现在近1000人，队伍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推广活动的举办，社会公众对古籍修复技艺越来越关注，也对古籍修复里的各种门道产生好奇。本期起，本报特开辟专栏，邀请山东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师侯妍妍解读行业术语，讲述修复技艺传承故事。



一本包背装或线装形式的古籍呈现在你面前时，你是找不到纸捻的。纸捻是看不见的存在。

纸捻是比较口语化的称呼。在书里，它分两种，一种是纸钉；一种是纸铜，俗称蚂蟥。我还是喜欢叫纸捻，听上去又轻松又俏皮，显得它无足轻重一样。其实并不。

纸捻的作用很大。在装皮、缝线、贴签等装帧程序之前，小小的纸捻把所有的单张书页按序集结起来变成书芯，起到了固定书芯、加固书籍整体结构的作用。用现在的话讲：纸捻是“团魂”。

在古籍装帧史的几大主流装帧形式中，蝴蝶装及蝴蝶装

之前出现的装帧中没有纸捻，蝴蝶装是靠糨糊粘结来集结固定书页的。直到南宋后期包背装装帧形式出现，纸捻才作为书籍结构主体之一应用而生。纸捻用有韧性的皮纸制作，也有的为了使纸捻结实，常在搓纸钉时埋进一根丝线，以起到双重保护的作用。像钉子一样一头搓成尖尖样子的纸捻名字叫纸钉，普通厚度和正常尺寸的古籍用两个纸钉固定就足够了。古人做书不讲究用太多的纸钉，够用就好，一来经济环保，二来“（书）眼多伤（书）脑”，不利于书籍保护。遇到厚的或者开本大的古籍以及金镶玉装帧形式的古籍等就需要用叫纸铜的纸捻来固定了。纸铜的叫法应该是源于“铜瓷”技术，就是把瓷器碎片儿用铜钉钉起来的古老瓷器修复技术，在《清明上河图》中也有铜匠“铜活儿”的场景。纸铜原是一个青瓷碗的代称。这个青瓷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残器之一。南宋时期，日本从中国得到了一个南宋龙泉青瓷碗，

纸捻

□侯妍妍 山东省图书馆

明朝时候龙泉碗破损被送回中国，当时大明已经无法原样仿制南宋时期的釉色，于是命工匠以铜的修复技术将龙泉碗修复，铜钉形似蚂蟥，因此此碗称为蚂蟥。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著名儒学家伊藤东涯在1727年写成《蚂蟥茶碗记》来记述此事，蚂蟥茶碗现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纸铜和瓷铜的不同在于，瓷铜外显，将伤痕变成艺术；纸铜内藏，默默成就一本书的风骨。

纸捻的搓法在各地都不一样，我的师父潘美娣教给我们的搓法是很讲究的一种。师父当年入行就是从搓纸捻开始学起，后来由于传业著述的需要，总结出了纸捻用纸的形状、尺寸：纸钉是大约7.5cm×5.5cm的直角梯形，纸铜是大约15.5cm×5.5cm的平行四边形。师父说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尺寸而已，具体还需要看书的厚度、开本等情况而定。师父搓的纸钉十分漂亮，空心而头尖挺有力。空心的纸钉顺应能力

强，穿进书眼后会随着书眼的大小展开或收缩，不会给纸张造成额外伤害。

蚂蟥的搓法各地大同小异，是两头尖且是麻花状的，中间一小段是平的，这平的一小段宽窄长短是根据一对儿书眼之间的距离来定的。好看的蚂蟥是直直的，麻花儿也拧得均匀而有美好的线条。

搓纸捻的活儿养神。我喜欢一次多搓些纸捻，各种尺寸的都预备一些，搓好放在小盒子里。光是看着心里就觉得踏实。我的纸捻盒子里有白色和古色两种颜色的纸捻，什么颜色的古籍就用什么纸张颜色的捻儿，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一种执念。纸钉穿进书眼后，剪去露在外面的小部分后捶平，一本书的雏形就出来了。纸张是肉，纸捻是骨，有了纸捻，书就像人有了骨头，立得住了。

纸捻藏在书里看不到，然而往往看不到的地方才藏着灵魂。你怎么可以容忍灵魂不美好？！

浙江图书馆： 馆藏文献 与戏剧艺术联袂登场

本报讯 3月27日，世界戏曲日，“柏龙华戏画艺术 浙图藏戏曲文献”联展在浙江图书馆开幕。浙江图书馆将馆藏文献结合戏画艺术，围绕世界戏剧日主题，开展了主题展览和相关的普及讲座、体验活动。

世界戏曲日是国际戏剧协会创立的一个纪念日，旨在弘扬戏曲文化，提升全世界人民对戏剧艺术的重视。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中国戏曲在世界戏剧文化的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

在浙江图书馆一楼展厅，戏画艺术和戏曲文献联袂登场，共同为读者呈现平时难得一见的别样戏曲文化。展览展出国家一级美术师、当代著名戏画家柏龙华先生戏画作品88件，浙江图书馆藏戏曲文献30部50余部，有剧本、工尺谱等。戏曲绘画和戏曲文献的结合，把深藏在古籍中的传统文化活化，让精深的绘画艺术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走入千万家。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4月10日。



绍兴图书馆古籍普查： 我们打过一场美好的“硬仗”

□唐微 绍兴图书馆



至今犹记得第一次看到满屋子古籍时被惊到的样子。2000 年，我应聘进入绍兴图书馆，当时正值新馆开馆，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偌大一个馆的搬迁。理所当然，我们这群新进员工成为了此次搬迁的主力军。现代书刊可以雇工打包搬运，但古籍不能假人手，得自己人清册、装箱、搬运和上架。那是一个冬日午后，空气中含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蜡梅清香。前辈带领我们几个人，缓缓打开了地下室那扇神秘的木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古籍，顿时被眼前铺天盖地的旧书聚集一室时所产生的强大气场震惊了。带队老师解释说，本馆有近 16 万册古籍，这里不是正式库房，存放的是未编书，古籍库房还有好几个呢。当时的自己并不清楚“未编书”是什么概念，直觉是一批被埋没的宝藏，呆在这里寂寞了很多年。那刻我在心里默想：如果有机会，一定尽心看护它们。

试点先行，“手册”生成

机会终于来了。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从中央到地方都感受到了古籍保护的“春风”，本馆的古籍保护工作也因风而动。首先开展的是硬件设施的全面升级，按照国家库房标准，本馆先后投入 1000 万资金对几个古籍库房进行全面改造，彻底改善典藏环境，也因此成功入选第二批“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其次是加强人员培训，主要针对的是修复和普查队伍的培养。2008 年秋天，我参加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全国古籍版本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任课老师均为国内版本目录方面顶级专家，他们的学识涵养，特别是爱书护书的一片赤诚，至今刻印脑海。

培训班结束后，本馆就开始利用 EXCEL 表（俗称 16 表）进行古籍著录。绍兴图书馆作为 52 家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单位”之一，也是浙江省内率先启动古籍普查的先行军之一。我们一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古籍状况基础调查，一边试点先行探索实践。当时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尚处于开发阶段，这种摸索前行的方式，为初创期的平台运行和之后《浙江省古籍普查手册》的制定，提供了实践经验。

2009 年 4 月，在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具体指导下，全省开始在全国普查平台上著录数据。同年 9 月，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建立了一个 QQ 工作群，群签

是浙江图书馆古籍部陈谊主任拟的：“与古为役，各自努力；守先待后，共同奋斗”。最初参与人数是两位数，随着普查队伍不断扩充，人数最多时达 400 多人。群里的学习气氛特别高涨，讨论问题，交流切磋，有时甚至会为了某个版本的确定争得面红耳赤。印章释读是最为常见的问题，往往是几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连蒙带猜，一段时间下来，大家的释读能力得到了共同提高。提问最多的是版本相关，其次是著录规范，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处理，那个情况怎么办，理由是什么？数据越做越多，碰到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争论多了，需要达成的共识也多，后来就有了《浙江省古籍普查手册》的推出。浙江省古保中心同仁为“手册”的编定投入了大量心力，不断磨砺，前后历经三版。因为绍兴图书馆作为先行部队之一积累了些许经验，2011 年 9 月，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徐晓军主任就把“《浙江省古籍普查手册》研讨会”的举办地放在了绍兴。全省 28 家藏书单位的 44 位普查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标志着浙江全省古籍普查工作的全面启动。同年 12 月，本馆确立普查方案，制定工作流程，实行技术保障，从其他部门抽调人手，设立专人专岗，普查工作有序开展。

层层把关，细节到位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古籍普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古籍普查，简单解释就像是给每部古籍打造一个“身份证”，此证包含索书号、分类、题名卷数、著者信息、存缺卷次、版本、版式、装帧、装具、序跋、刻工、批校题跋、铃印、丛书子目等 16 个大项 74 个小项的信息，除此之外，还要对每部古籍定级和定损，即依据年代版本的优劣、是否经名家批校题跋、存世稀缺程度等进行定级，同时结合实物的破损状况进行定损。普查平台在设计时为保证每条数据的准确度，设置了多道程序。首先是著录，包括信息著录和书影上传，完成后提交本单位审核，即一审，数据合格则通过，发现问题则退回处理，修订合格后才算完成。之后再由一审提交浙江省古保中心进行二审，二审之后还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三审。整个普查是个层层把关的过程。普查要求从著录员到一审员都必须目验原书。普查数据实现全省联网同步上传，并且需要提供大量的书影来佐证文字信息，方便后期的覆核和利用。当时我既为本馆的一审，还曾一度兼着省中心的二审，白天加晚上连轴做数据，生活中似乎只剩下“普查”两字，忙碌之后最大的获益是业务能力确实在强压之下被催逼着提升。

2014 年 7 月，在普查任务最为紧迫繁重的时期，一批文史专业的高校毕业生为本馆的普查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都有着良好的专业背景，但同时没有一个之前接触过古籍。带领新手最开始是一段艰难行进的过程。古籍编目专业性太强，不仅需要文献学知识，更需要经年累月的经验积累，同时还要求普查员娴熟地方史，即对越地历史地理、大小藏家、世家大族、地方人物有一定的敏感性，尽量避免因相逢不相识而与某部乡贤手稿擦肩而过的遗憾。目录版本学是一门实学，实践出真知，不可能

一蹴而就。开始的进程很慢，每一条数据都会来回返工数次，但年轻的普查员们功底好，学习劲头足，你追我赶，快速成长为合格的普查员。渐渐地，整体速度加快了，质量提升了，本馆的数据受到省中心的肯定，并由此获得了浙江省内具有二审免检资格的第一家。

当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未编书的编目。因历史原因，本馆古籍普查开展之前有近 6 万册未编书，约占馆藏五分之二，以开本大小排架，仅有财产册次目录。而已编的近 10 万册古籍中，也只是简单手写卡片目录，想要厘清它们谈何容易。对于从未接触过古籍的新编目员来说，未编书的著录尤为艰难。首先需要排查是否为已编古籍的配本，通过题名著者、版本、卷次、题签、铃印、批校题跋等，包括各种能够在藏本上找到的微小信息，进行排查、筛选、确定和补配，渐渐地大家也能找到一些小窍门。找配本的过程，特别像在做功德事，就像帮失散多年的孩子找到原生的家。如果能够在配本中找到遗珠，譬如我们在普查后期于未编书中找到了古越藏书楼的旧本、赵之谦和李慈铭的批校本、沈氏鸣野山房的稿钞本、寿氏三味书屋的铃印本等，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欣喜之情更是无以言表。

由于古籍的情况比较复杂，普查过程中，还有各种不可预测的情况。有的碎本仅存散页，无头无本，让人无从考证；有的书叶因虫蛀、鼠啮而残破不堪，得多次查验全书，慢慢揭开书页，辨认模糊的墨字加以记录；有的书仅刻工一项就多达上百人，著录起来着实不易；有的书部头巨大，几十册甚至数百册，排序整理一遍费时费力。记得我们有上千册的《四部丛刊》存放在前后两排加起来八口书柜中，它们貌似整齐，实则无序。从民国 8 年（1919）到 25 年（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四部丛刊》初编、续编及三编，仅初编又有三次印行，上千册古籍混放，想找其中任何一种都难上加难。为此，两位同事互相配搭，根据目录按图索骥，仅此一项清理，就忙活了整整一周。

普查进行得异常辛苦。夏日酷热，冬天苦寒，八九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密闭不透风。每个人一辆手车，桌上堆满古籍、电脑和各种参考工具书。空气中都是灰尘，即使戴着口罩，每个人的

鼻孔还是黑的。往往一部书著录完，白手套瞬间变为黑手套。普查后期，随着各馆的进程加快，数据量猛增，网络塞堵厉害，有时打开一条数据得费时好久，上传书影更是不易，传着传着电脑死了机，让人想撞墙的心都有。我们只能随之应变，采取错峰措施。白天网络拥挤时，尽可能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清晨、午休、下班后网络畅通了，我们再打它个错时战。加班加点是那时的家常便饭。有一阵子我们还集体晚上留守加班。干了一整天的活，虽然累到腰酸背痛嗓子疼，但不经意间望见月光投影下树兰先生似在颌首微笑，心中有莫名感动。

十四年埋首，打一场“硬仗”

像这样埋首旧籍，全心投入的工作模式，我们前后坚持十年，合力冲刺四年。至 2016 年 6 月，圆满完成普查任务，共计编目 29996 种 148838 册（含民国线装书）。绍兴图书馆历史上第一次摸清了古籍家底，古籍目录体系建设基本完成。善本数量明显增加，由 3915 册增至 17993 册。地方文献资源更为丰富，由 518 种增至 4503 种，10082 册。古越藏书楼旧藏有所补充，由 5000 余册增至 10000 余册。首次完成“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系列稿钞本的编目，共计 284 种，1878 册。2017 年末和 2019 年初，《绍兴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和《绍兴图书馆藏民国时期传统装帧书籍普查登记目录》，相继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至此，绍兴图书馆的古籍普查工作结束，我们打赢了一场美好的“硬仗”。

曾经遇到过一部明显有着前人修补痕迹的清乾隆刻《平山堂图志》，版画精美，惜残败不堪。书衣有旧主人的墨题：“前人画工镌刻不知经多少经营，但恨后人不能珍存以致残废，可惜也。前古山河、多少人物，岂不皆然？不忍弃置，特用白芨粘存之。”读罢此段，耳边犹闻前人的叹息声。是啊，古籍不仅是旧时藏家的宝贝，更是绵延数千年中华文脉之所系，是文明幸存者，也是时代见证人，穿越时空与今天的我们相晤，将之保护和传承好是历史交付我们这代古籍人的使命。而自己在有限的职业生涯，和同仁们一起，能够借着普查这个难得一遇的机会，将馆藏古籍摸排一遍，厘清百年家底，近距离守护古书，谁说不是三生有幸呢？



师有宽：

积一甲子之功，促修复技艺代代传承

□ 本报记者 刘晓立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中更是如此。1942年出生，参加过“全国第一期装修古旧线装图书技术人员训练班”的师有宽就被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同人称为“一宝”。他是“国手”张士达先生的得意之徒，曾以一己之力承担起甘肃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60年间，他在古籍修复中经历“三起三落”，但从未放弃。2014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成立后，为将接力棒传下去，他一直在路上。

一段刻骨铭心的师生缘

“我是1959年12月，从‘苦甲天下’的甘肃省会宁县来到兰州市进入甘肃省图书馆工作的，当时是勤杂工，主要工作是给全馆职工供开水，因为表现很好，工作踏实认真，能吃苦，所以才有机会被选派去北京学习古籍修复。”那是在1961年，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举办“全国第一期装修古旧线装图书技术人员训练班”，从全国选派人员到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学习两年，训练班采取师带徒边教边学边做的方式。师有宽一直很感恩自己的吃苦精神，他认为，能吃苦是劳动人民的本色，也是他能走上修复之路、并做好古籍修复的重要原因。

在训练班的两年时间里，师有宽有幸接触过很多业界名家，修复领域有名的“三肖”（肖顺华、肖振堂、肖振邦），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冀淑英先生、李致忠先生等，都曾深深影响他。而与恩师“国手”张士达先生的那段师徒缘，更被他称之为一生中刻骨铭心的记忆。“先生知识渊博，鉴定版本和鉴别纸张的经验非常丰富，反复教我看、拉、摸三种技巧。”所谓“看”，即观察纸张细腻度、匀整度及色泽等；“拉”，测试纸张是否坚韧有力、耐久性强；“摸”，识别纸张质地柔韧性及平整光滑度。“我记得师傅说，各种纸张都有它的鼎盛期，宋麻、明棉、清开化。”师有宽回忆说。师傅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修复技法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品质，则影响了他的一生。“张士达先生常常强调，这是一门手艺活儿，每道工序都得细致认真，不能马虎，上道工序做不好，会影响到下道工序，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前功尽弃，做出来的活儿肯定不成样子。还说做手艺活儿，必须眼到、手到、心到。”说到师傅的言传身教，师有宽难忍激动地说：“就是在那两年，我逐渐爱上了古籍修复事业，并一直坚守至今。”

在训练班学习期间，学习技法的难度是循序渐进的，从一般破损的普通古籍到严重破损的珍贵古籍，包括对技艺有极高要求的“金镶玉”，师有宽都在师傅的指导下有过接触和深入学习，让他感到骄傲的是，他还曾有机会见识“国宝”《永乐大典》的风采，并上手帮师傅把三册《永乐大典》的书皮包裹粘好。

修复路上练就“十八般武艺”

结束了学习之后，师有宽于1963年8月回到甘肃省图书馆，很快便开始一个人在新设立的古籍装修室摸索、工作。“当时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购置了一些简单的设备和材料、工具，10月份之后，我开始动手修复一些残破的普通古籍。可惜的是，几年后赶上‘文革’，修复工作也暂停了。”

再次恢复古籍修复工作是在1978年，那时候甘肃省图书馆装订工厂成立，师有宽作为负责人被委派到南京制本厂学习精装技术，但他时刻不忘古籍修复事业，回来后经与领导研究，在装订工厂设立了精装组和古籍装修组。“精装工作发展很快，不到两年时间就有6人能熟练操作各道工序，能够完成馆里全年期刊杂志的精装任务，甚至承接了兰州市部分大专院校图书馆的精装工作。古籍装修组也培养了几名修复人员，每年修复残破古籍300余册。”但古籍装修组一直面临着各方面困难，到1982年甚至一度要关停。“当时工作台是破旧的阅览桌，压平用的是被报纸包裹着的砖头，就连做糨糊的面粉都要写报告到粮食部门审批，所用修复旧纸还是和废品收购站建立联系，拿成倍的废报纸交换来的……”

讲到当时的修复状况，师有宽感慨万千：“我觉得近些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古籍修复工作，经费和人员都得到了保证，特别是古籍修复人员的职位、职称和工资等方面得到较大改善，使这个行业能留住人才，得到发展。”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后，在历届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甘肃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成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还获批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得到甘肃省文物局颁发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书，在人员及配置上已经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近些年完成的清代珍贵剧本的抢修工程还成为古籍修复保护的范例。“这批剧本皆为手抄本，纸张是价廉质劣的土麻纸、粉连纸、毛边纸，以及本地产的土纸等，材质、大小规格不一，而且90%以上不留天头地脚，纸张酸化、霉变、虫蛀鼠咬、水湿油渍粘连等特别严重，修复难度极大，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师有宽介绍说，在具体修复时，要把修补古籍的“八法”技能全部用上才行。

所谓“八法”，即揭、洗、补、托、裱、接、衬、镶，特别是在揭上下的功夫最大。”对于一些水湿、油渍粘连特别严重的古籍，要想把整册书页揭开，师有宽每次都会先采取“湿揭法”或“沸水泡揭法”，如果还揭不开会采取“蒸揭法”。“我记得在揭《金川会》时，因书口油渍粘连得特别严重，用前面几种揭法都无法揭开，油渍也清除不掉，我们动脑想出一个办法，在书页上衬吸水纸，用加热后的电熨斗在吸水纸上施加压力，使书页上油渍发软而

粘在吸水纸上，抽换几次吸水纸后，书页变得稍干净些，也没有粘性了。”师有宽说，古籍修复是手工活儿，每个人在修复中所执手法有时相同，有时不相同，都是根据自己的用手动作习惯，有时也会根据古籍的不同受损情况选择一些新的做法。

遵循“整旧如旧”的总原则

修复古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古籍，延长古籍的“寿命”，使之源远流长，但修复方法不当、操作技术不规范，工作中粗心大意或者修复材料劣质，都会给古籍带来损害，师有宽强调，一定要遵循“整旧如旧”原则。所谓“整旧如旧”，就是保护古籍的原貌，具体来讲，就是保持古籍的文物性、资料性和艺术性。在修复中，必须忠实再现古籍的原始文献形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师有宽认为，古籍的资料性主要体现在书页上承载的文字、图像等信息上，修复时要注意保留这些信息，遵循“片纸只字”不能丢失的原则；古籍艺术性则体现在书皮、书签、书角、书口等部位，是否平整，各部位之间占比是否恰当、颜色的搭配是否和谐等，这些都是在修复中需要保留的细节。“我们现在常常说四大修复原则，其实后三条，包括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最少干预，以及过程可逆，都是围绕着‘整旧如旧’这个总原则制定出来的，其本质都是为了保护古籍。”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在师有宽看来，遵循修复原则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即不能立即修复的要懂得放手，不要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在修复工作中，常常看到一些不当修复造成的损伤，每次看到都会心痛不已。比如任意改变装帧形式；将大幅拓片割装成册；对易洇化的古籍在修复时大量使用水，造成跑墨污染；过度使用化学剂清洗书页；不按纸张的性质、色泽深浅、厚薄配纸；使用机制酸性纸或胶带纸补古籍；有的修复时不专心，造成倒页、错页，甚至丢页，等等。”就像当年张士达先生告诫他的一样，师有宽也常常在多个场合强调，做手工活儿，必须做到眼到、手到、心到。眼到，就是专心致志仔细地观察；手到，就是动作灵巧、速度快、操作规范；心到，就是要细心、耐心、专心，最重要的，要有敬畏之心。

基于此，师有宽在日常修复工作和授徒过程中总结出做好古籍修复的“七要”，

即要做出精准的修复方案；要保证修复材料的绝对安全和修复古籍资料的绝对安全；要细心、耐心和专心；要熟练掌握“八法”修复技艺；要保持原装订形式的高雅；要做到“整旧如旧”；要虚心学习全国同行业的先进经验，进行技艺改进、创新。

创新是时代进步的要求

师有宽认为，古籍修复要传承，首先要传承精益求精的修复技法，但在国家各行各业日新月异、高度发展的时代，古籍修复事业也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时代进步的要求。“纸浆补书机的出现及应用，尽管目前还有很多不适应性，但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古籍修复会实现机械化，而这就要依靠掌握精湛技艺又知识渊博的年轻人。”

将古籍修复事业代代传承下去，是师有宽的愿望，也是他近些年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我觉得要传承古籍修复技艺，首先要做好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可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牵头做好组织规划，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制定加强古籍修复专业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此外，要更好地发挥古籍修复专家的作用，除传习所和高校学科建设的模式，还可以考虑在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设立专家工作室，并对全行业开放，形成古籍修复专业人才定期交流机制，以专家带骨干、骨干带团队的模式，逐步形成人才培养的梯队。

“在传统修复方法传承和培养的基础上，还要把现代科技运用到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上，比如可以采取远程培训的方式，既节约成本，又扩大培训面，惠及更多对古籍修复感兴趣的年轻人。”创新传承模式很重要，但师有宽始终把人才放在首要位置，他认为，要注重从工作中选拔留得住、用得上的青年人员进行培养。“也可以从民间古书收藏家群体和古字画装裱店选拔一些修复装裱高手，加入到古籍修复队伍，扩大修复业务范围，改进和提高修复水平。”在师有宽看来，要重视民间修复力量的培养和发展。很多古籍修复界的前辈都是从民间古旧书店走出来的高手，没有他们，也就没有古籍修复繁荣的今天。“当然，选拔的人才要有心灵手巧的天分，要有数十年如一日的定力，还要有对古籍修复事业的赤诚之心。”师有宽强调。



锡字聚珍 文明倒影

□翁连溪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吾友王君，积学之士，书法名家也。更承祖上医家之法，悬壶济世，为京城名医也。君典藏医家秘籍尤多，通经达纬，素志怡淡，又于佛教义理，深有感悟，为立人之本、行事指南也。兄性喜聚书，承家藏外，更苦心营求，所获珍本秘籍渐多，稀纸善本渐富，多年来孜孜以求，为同行称道，可称一藏书小家也。其书斋名曰“三通书屋”。

何为“三通”？今春闲暇，有朋过访，观书探讨，忽传来富龙兄新收的《三通》照片多幅，询版本等事。《三通》者，乃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是也。观是书，每半叶十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文献通考》卷前有《御制重刊文献通考序》，知此书当以清乾隆武英殿刊《三通》为底本印就。虽行款与殿版一致，然行字之间错落有致，为活字本之特征；细细察之，乃清咸丰二年（1852）广东佛山邓氏锡活字印本。活字本历来为藏书家所重，所见者无不重金求之。然是书仅公藏一部，若非君藏，安知世间私藏尚存锡活字本耶？

夫印刷之术，若言其小，曰玺印者，发乎先秦；其大曰雕版曰活字者，则兴乎唐宋之际也；二者皆由来尚矣。盖文明之发展，有创新、有进步，而逐步趋于完善者；智者学士为之，文人雅士好之，技术材料兴之，皆所为之动力也。至若我国活字之发展兴盛，初始于宋，兴于明清；沈括《梦溪笔谈》言“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首开活字印刷之先河；又元王桢《造活字印书法》创木活字并转轮检字法，更言“近世又有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为最早载锡活字之文献。后世凡有活字印书者，多仿效之；此

二法实物虽未能留存，然今人考古所见西夏文佛典《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仍为存世最早木活字印刷之实证，皆早于西方之活字排印法，为我华夏文明之绚丽瑰宝。

比及明清，时人用活字版印书，此风大盛。随经济之繁荣、工艺之进步、材料之创新，制字更取材于铜。如明弘治华燧会通馆《宋朝诸臣奏议》《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正德华坚兰雪堂《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嘉靖无锡安国《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万历周堂《太平御览》等约六十余种。清铜活字者如康熙江苏吹藜阁《文苑英华律赋选》、内府造《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御制数理精蕴》《律吕正义》、道光福田书海《音学五书》、咸丰麟桂《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约十余种，虽不及明代之多，但就规模之大、铸刻之精，更兼有朝廷参与其中，亦为世人所瞩目。

至如铅字、瓷字、泥字、锡字则更为稀见。明弘治正德间陆深《金台纪闻》云：“近日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始为铅字首载于文献，清道光间魏崧《壹是纪始》曰：“活版始于宋，明则用木刻，今又用铜、铅为活字”，惜二者实物无存，后西洋铸铅法传入方取代之。清人金埴《巾箱说》言“康熙五十六七年间，泰安州有士人忘其姓名，能锻泥成字为活字版”，大抵指泰安徐志定之真合斋创用磁刊《周易说略》《蒿庵闲话》二书，然“磁版”亦或“瓷活字”今人尚存争议。新昌吕抚，于乾隆元年（1736）印活字泥版《廿一史演义》，兼有活字并雕版之特征。苏州李瑶，清道光间以泥活字印《南疆绎史勘本》《校补金石例四种》，有日人赞其乃“中国胶泥板之标本”。泾县翟金生读毕昇有感，创泥字十余万，称“泥斗版”，亦名“澄泥版”或“泥聚珍版”，印有《泥版试印初

编》《屏山书屋集》《水东翟氏宗谱》等，其泥字今尚存百余枚，实属不易。

前述元王桢所提锡活字，实物无存，且明华燧“范铜板锡字”今仍有争议；进而富龙君所藏锡字巨帙之《三通》更为稀世遗珍，世所罕有。时清鸦片之役后，广州为五口通商之一，商力渐充、交易日盛。佛山邓氏以博彩为业，道光三十年（1850）始铸锡活字印“闹姓”“白鸽”二票，较西洋铸字法更为简便；又开岭南寿经堂书坊，余暇使活字印书牟利。至咸丰四年（1854）红巾浩劫，锡字悉数制成枪弹；五年间共制字三副，曰大长字、小长字、扁体字，共计二十余万；今扁体字尚无考，前二种字所印之书，除此《三通》外，还有《十六国春秋》《陈同甫集》尚存于世。

如论活字印书之比雕版若何，《梦溪笔谈》载“若只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武英殿聚珍版程序》记“凡遇大字书，每人一日可摆二版，小字书只可得一版”；吕抚《廿一史演义》用泥版活字“一人撮，两人印，每日可得四页”；邓氏锡字排印成《文献通考》凡三百四十八卷之皇皇巨帙乃不到两年，可谓神速。然每印就百千部，书未多销便拆版再印他本。泥、木尚如此，何况铜、锡乎？凡制铜字，用铜必多，非富家不办。若铸钱尚不给，何有于活字？铜字之兴，恰在其时，故木活字代之而起也。明可考约百十余种之多，清有武英殿聚珍版之巨；加之明清以来诗词文集家谱，不胜枚举。然比及雕版可存十年百年再印者，又可化身千百，以垂久远。致使明清以来铜活字、木活字、瓷版、泥版今均成稀世珍本；锡字更如昙花一现，今只存邓氏一家，可谓空前绝后，为藏家之至宝也；今君得此《三通》在手，尺幅间尽显活字蜕变之魅力；望君观而乐之，惜而爱之。

《载阳堂意外缘》四卷十八回，一函四册，清周竹安撰，清末抄本，现藏于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

是书用墨笔精抄，避清讳，无板框栏格，有铅笔校注。书前有署“道光辛巳季冬题于花山官舍”之“白下梓材龚晋”序。首卷前有《意外缘开场律诗》一则。序前钤阳文方印“怀云馆藏”，卷端钤阳文长方印“益津张氏珍藏之印”。

是书卷端不署撰人，序中提及“毘陵周竹安先生”，并称其“于花山官舍闲暇之余，复传《意外缘》一书”。因此可知作者为周竹安，竹安当为作者字号。是书严格说来为晚清小说，因与戏曲同属俗文学之列，又与戏曲、曲艺等其他形式关系紧密，故亦录于此。

故事主人公为嘉靖间缙绅子邱树业（字玉坛），“略知经史，酷嗜烟花”，因嫌弃妻子童氏容貌不佳，一心猎艳，后自卖自身入尤家，追求表姑尤氏（小字环环），最终两人相伴，寿终正寝，乃至位列仙班，子辈也都同登仕籍。尤氏夫家为商人卮史堂，室名“载阳堂”，是书因此得名。故事骨架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吴音弹词《三笑姻缘》，故事饶有奇趣，但多露骨的艳情描写，故常被归入淫词一类。

是书又有复旦图书馆所藏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书局石印本，题为《绣像载阳堂意外缘》，著录为“周竹安（秋斋）撰”。每半叶十四行，行三十二字。首卷前有绣像十二幅，为天师大藏抄本所无。又于孔夫子旧书网上见另一清末石印本《绣像载阳堂意外缘》，今持两本相较，可知二石印本目录前俱有《绣像意外缘辨》一篇，为抄本所无。前者署“秋斋自序”，后者署“光绪十有二年小春月上幹秋斋自序”，中提及“余于庚辰岁游幕岭南花山官舍，暇日与同年友金陵龚梓材者把酒谈心”。按若此《辨》所述属实，则是书作者当为秋斋，亦即周竹安，故复旦大学图书馆如是著录。但道光辛巳为道光元年（1821），庚辰年则当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与孔夫子网本之秋斋自序所署光绪十二年（1886）跨度太大，于是又有学者认为“所谓毗陵周竹安先生，纯属杜撰。金陵龚梓材，亦未必可信”（参见豆瓣网帖子《清代淫词小说新发现—绣像载阳堂意外缘》，作者ID：蜥蜴小姐）。今据复旦大学藏本，原无“光绪十有二年小春月”数字，故此或为后来出版者所加，不可尽信。

天师大藏本有铅笔校注，据其内容，可知校者所据当为石印本。如龚晋序后有墨笔所抄“新安天中生题于粤东”一行，校者用铅笔将“题于粤东”改为“书于沪上”。今核石印本，可见龚序后即有“新安天中生书于沪上”一行。又目录末二回题目缺下半部分，校者皆用铅笔补完。

据卷端所钤“益津张氏珍藏之印”，是书曾藏霸州张震、张文田处。

清抄本《载阳堂意外缘》

□凌一鸣 天津师范大学

